

鄧尉山聖恩寺志

謝孝思題



《鄧尉山聖恩寺志》編輯委員會編



廣陵書社

鄧尉山聖恩寺志

周文祥題



《鄧尉山聖恩寺志》編輯委員會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尉山圣恩寺志 /《邓尉山圣恩寺志》编辑委员会编. —扬州:广陵书社,2008.4

ISBN 978-7-80694-320-5

I.邓… II.邓… III.佛教—寺庙—史料—吴县 IV.B947.2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3491 号

ISBN 978-7-80694-320-5



9 787806 943205 >

书 名 邓尉山圣恩寺志

编 者 《邓尉山圣恩寺志》编辑委员会

责任编辑 胡正娟 邱数文

出版发行 广陵书社

扬州市文昌西路双博馆附二楼 邮编 225012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扬州市机关彩印中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9 × 1194 毫米 1/16

印张 21.625 插页 8 字数 300 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694-320-5/K·143

定 价 128.00 元



圣恩寺全景



观音殿



天王殿匾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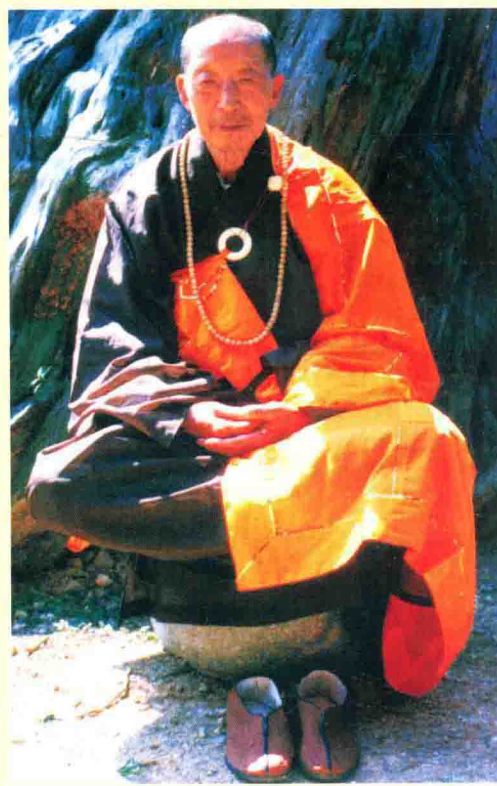
融宗像



融宗和尚带领大家劳动



融宗青年时代照片



融宗打坐



圣恩寺山门雪景



大雄宝殿



水陆法会



钟楼佛像开光



明学大和尚与真法法师



真法法师撞钟



融宗和尚与弟子们合影



编委会会议场景

序

序

圣恩古寺,明末周永年曾为撰志。民国初年,略加补充,又予重印。近百年来,未有补修续编。融宗晚年,发愿重纂寺志,以启山林。

圣恩禅寺,初创于唐天宝间。元末万峰莅山,承传临济一脉。历代古德高僧辈出,梵宇辉煌,帝王驻蹕,翰墨飘香。中途屡经沧桑,有古柏为证。“文革”十年,殿刹蒙受浩劫。近二十年来,融宗率徒恪守操持,佛寺重光。如今山门、牌坊、天王殿、大雄宝殿、大法堂、藏经楼、伽蓝殿、祖师殿、還元阁、钟楼、念佛堂……次第修复,古寺再现昔日名蓝之貌,佛刹重振临济祖庭之风。

融宗大和尚,继圣恩法席五十八年如一日,苦行翹勤,历经磨难。经抗战、“文革”多事之秋而矢志不渝,几舍生命护宝,坚守祖庭,领众修行,时人以“历劫不磨铁罗汉”赞之,实当之无愧。晚年,仍居破垣,纳粗粮,克己俭约,所得布施,悉用于佛灯之传。祖庭再灿,其事其绩,可敬可佩。

欣闻新志编撰,历五载,经会审而见稿成,倍觉宽慰。诚邀老衲为志作序,再推不却,勉缀数词,聊志之缘起尔。融老大愿遂成,必将含笑于寂光矣。

佛历二五四八年秋

书于灵岩寺方丈室



序

徐刚毅

读张志新先生主编的《邓尉山圣恩寺志》，想起了很多事情。

第一次听说玄墓山，听说圣恩寺，是在一九六八年的夏天。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支派”、“踢派”武斗，大动干戈，你死我活了六个半月，烧了三把火，死了一百多人。后来在周总理的关注下，武斗终于被制止了。苏州“支”、“踢”两派和驻苏部队各派代表赴北京谈判，签订了一个“十五条”协议，实现了造反派的大联合。然而造反派一联合，不造反的人就又开始遭殃了。在揪出所谓的“武斗黑手”的口号下，“苏革会”在玄墓山和圣恩寺举办了好几期学习班，学习班上固然也追查了一些派头头的问题，但更多的群众和干部却就此受到了株连，成为批斗和审查的对象，有的后来还被迫害致死。其间许多骇人听闻的故事虽然并不都发生在这里，但事情总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对玄墓山和圣恩寺就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过了二十多年，我才知道，其实这是冤枉的。原来圣恩寺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已经被部队占用，方丈、和尚也随即离开了。那次学习班，不过是那批夺了苏州市党政大权的造反派们向部队借地方搞运动整人而已。于是我对圣恩寺就有了些许歉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已在苏州市宗教局工作，那次上山，是与吴县宗教科的同志一起为恢复圣恩寺来作实地考察的。那时候的圣恩寺，大殿刚刚修好，佛像正在装金，不少善男信女都在磕头念佛，功德榜上则记录着许许多多为寺庙捐钱捐物者的芳名。天王殿里则是一塌糊涂，因为部队的木工班刚刚搬走。而与融宗法师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到处都朽烂不堪的殿堂里。他面孔笑嘻嘻，一袭灰旧的僧衣，胸前一串极普通的菩提子佛珠——融宗法师永远是这身装束，无论是在尘土飞扬的修建工地上，还是



在庄严肃穆的会议场上,而且面孔上也永远是笑嘻嘻的。见惯了出则坐车,入则簇拥,整天穿呢着绸,佩带宝石佛珠,面孔也永远都是一本正经的一些寺院大和尚,再看到融宗,心里就觉得,这个和尚了不得!

第一次见到融宗,很感亲切,但与他谈话,却觉得他有点自说自话,一门心思。听吴县的同志说,圣恩寺的恢复,涉及到与部队的关系,难度极大,上级有关部门一再叮嘱,不要操之过急。可融宗却我行我素,前脚刚刚关照过他,不要再擅自修建了,可后脚他就又在接受一班信众和上海客人的捐助,而那些信众和客人偏偏相信他。捐款虽然有多有少,但总能够源源不断。融宗便依靠这些资助,将殿堂一座一座地恢复了出来。这一次,吴县宗教科的同志又蛮严肃地批评了他,他陪着笑脸,连连点头,承认有错误。这样一位老法师,独自在深山,为恢复寺庙和名胜古迹呕心沥血,还要受到批评,我在旁见了也觉得过意不去,便悄悄对吴县的同志说:“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谁知县里同志却笑了,说:“这叫周瑜打黄盖,大家愿意。”因为上级领导对融宗在没有办好手续的情况下就重修殿堂很有意见,就批评县宗教科,于是宗教科的同志就将批评转嫁给融宗。而融宗也知道宗教科干部的苦衷,所以只要一批评,总是低头认错,一脸的诚恳,让干部可以向上交待。而等干部一走,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对此,宗教科的同志也心照不宣,有意放他一马。这样的“放马”放了好多年,后来由于军方和官方对党的宗教政策认识逐步深入,落实政策也就逐步到位,圣恩寺终于重建成功了!融宗法师于二〇〇〇年正月十六日圆寂,终年九十岁。想当初他发愿重修圣恩寺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正因为来日无多,他才我行我素,否则,这座千年古刹,恐怕直到今天,还是废墟一片。

恢复后的圣恩寺我又去过多次,对寺庙文物古迹也知道了不少,但对寺庙的历史却不甚了然,这次读到了张志新先生主编的《邓尉山圣恩寺志》,对这座唐宋以来的名刹又有了真切的了解。张志新先生在吴县从事文物工作多年,在“十年动乱”时期和后来的拨乱反正的岁月里,曾为保护吴中文物与名山风景出力献策,阻止过在石公山的开山破坏活动;当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欲在华山采石时,又说服领导移地别凿;对于圣恩寺的恢复重

建工作,他也是倍加关注。后来即使下海经商,对于文物保护仍是一往情深,故深得融宗信赖,被委以修志重任。他无数次往来于苏州与玄墓山之间,采风踏勘,查找资料,核对史实,五度寒暑,数易其稿。其间融宗师圆寂,又得真法师鼎力支持,终使志书圆满问世。

真法乃无锡人氏,曾是某国营大厂的工程师,年近六旬方始出家,然其与圣恩寺的因缘却颇具传奇色彩。融宗晚年时常留心人才,却苦于难寻,深以为憾。一次却对前来参访的无锡居士林林长施炳荣道,日后当有无锡人来山嗣法,而彼时真法还尚未出家!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真法定于斯日前往山寺,不料隔日夜间天气无常,狂风大作,始打雷,继大雨,又落下冰雹,半夜更是大雪,雪且很厚,真法却行程依旧。到苏州火车站,询问玄墓山,人皆不知,等摸到山寺,已是傍晚,当夜宿下。次日一早起床正欲前往参拜,不料融宗先自跑来问候,真法大为感动。不久便在寺内剃度,第二日就去常州天宁寺受戒。真法主持道场,担当兴修事务,爱惜文物古迹,深得山寺古风,六百余年祖庭得以传承,脉络依旧相沿,真乃圣恩寺幸事也。

融宗重建了庙宇,现在又有志书问世,这两件可以说都是不朽的事情。将来的日子,文明将主导世界,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但愿再也不要发生因为各种因素而毁坏人类文化遗产的事情了。

二〇〇四年四月



序

张志新

一九九九年初秋,我应苏州园林局之邀,参编《苏州假山》一书。书中有“真假山”篇目,驱车实地考察,并向圣恩寺住持融宗大和尚商借《邓尉山圣恩寺志》一阅。此《志》成书之日久远,后世变化极大,融宗久有重辑之愿。这次见到我,融宗立即将此事托付于我。

我于一九七三年调任文物管理部门,曾为圣恩寺的保护做过一点工作。一九八八年离开文管会后,追忆当年:尽管对圣恩寺,仅作为文物来保护,与宗教无涉,但对这里的建筑、文物、古树名木以及融宗大和尚都深有感情。融宗既有委托,我欣然应命。尽管现在我所在的单位工作很忙,但仍发愿尽自己绵薄之力,编好这本志书。

我不是佛教徒,对佛教深厚的哲理,也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因此要编好这本佛教寺院的志书是困难的,编志只能在学习中开始。

佛教,是我国三大宗教之一,它起源于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南印度,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华民族历来具有主动吸纳外来思想文化的气魄与胸怀,吸收印度佛教的精髓,并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儒学汇流交融,而形成中国化的佛教,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释迦牟尼虽振法鼓于天竺,却扬法音于华夏”,此话一点不假。

孙中山先生说过:“佛学是哲学之母。”历史上的哲学均起源于宗教。鲁迅先生也曾说过:“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释迦牟尼鼓励其弟子要以超然的方式观察世界,其理论具有深厚的哲理。人类思想中重苦难,重智慧,亦重悲愿,唯有佛教能充类其至。特别是佛教中的禅宗,境界尤为高超。它主张一切众生心无例外地具足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众生无须别求于

人,别求于神,别求于任何外力,而完全有能力存在;自我解脱,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给人以超凡入圣的信心。因此,佛教在历代各阶层中都有许多人修习持奉,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邓尉山圣恩寺,即出自中国佛教禅宗中临济宗一脉。寺始建于唐、宋,而于元末有禅宗临济宗二十一世传人——万峰时蔚禅师卓锡开山,后经数代高僧的操持增建,成为吴地最有影响力的佛教寺庙之一,一直享有着临济正宗“祖庭”的地位。明末盛传的“禅宗莫盛于临济,临济之禅莫盛于三峰,三峰之禅莫盛于圣恩”的说法,就充分说明它在佛教界的地位。以至清初康乾年间二代君皇数次驻蹕,贤士大夫题联书碑,墨客骚人吟诗作文,……给寺庙留下了深厚的历史人文景观。寺中至今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宗教文物。

圣恩寺所在的光福镇,又素有“吴中山水之冠”的盛誉。寺枕邓尉山,而面朝浩瀚的太湖。山中遍植梅树。花开时节,“千顷一白,香漫数十里”。清初江苏巡抚所题之“香雪海”,形象地概括了这里初春的景色。一年一度的邓尉探梅,几成苏州人的风俗。清代画家“一蒲团外万梅花”的手卷,又融寺于花海之中。因此这里又有着深厚的旅游资源。

回顾圣恩寺的历史,它有过辉煌,也曾遭遇过“三武灭佛”、“太平天国焚庙倒佛”、“破四旧”之类运动的摧残。但它就像广原青草,具有不可摧毁的生命力。圣恩寺在“文革”期间,其附属建筑几被拆毁殆尽,所剩的主体建筑,也在风雨中飘摇,岌岌可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的宗教政策的逐步落实,圣恩寺中兴五十七代住持融宗禅师为复兴这一禅宗祖庭,竭尽毕生精力。他修缮寺中古建筑,恢复藏经阁、還元阁、钟楼等一批寺中著名建筑,重铸一万二千余斤的法华大钟……使吴中这一古刹重现了昔日的风采。

圣恩寺历史上曾编过“志”。明嘉靖时沈润卿曾首编《邓尉山圣恩寺志》,明崇祯年间,周永年也曾编纂过《邓尉山圣恩寺志》。但这两部《志》均成绝响。民国初年,寺僧中恕一度也想编“志”,但由于时局动荡,并未得有志于这一事业的人着力完成此事。只能延请张一麋先生题签、李根源先生

加跋,并加入部分清代的内容予以印行,现在尚能见到的即此版本。而民国印行至今,又已历七十余年,因此重新编撰《邓尉山圣恩寺志》是融宗禅师久有的心愿。我受融宗所托之后,为使本《志》能真实全面地反映这一古寺的情况,多方查找资料,访问耆老,核对史实,撰写文稿。多次往返于苏州与邓尉山之间,搜集融宗和真法和尚的“三亲资料”。初稿写成,打印数十本,发给编委人员,召开编委会全体会议,广泛征求意见,进行修改。融宗晚年,心力憔悴,但仍一直关注着本《志》的修订。各界贤达,对本《志》的编撰也都十分关心和支持。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前苏州市宗教事务局局长徐刚毅先生乐意亲为作序;苏州市政协副主席谢孝思先生,前苏州市文化局局长周文祥先生为本《志》题签;吴县摄影协会会长汪朝俊为古寺摄影,并提供了旧有的资料照片……同志们的努力使本《志》渐趋完善,增加了许多光彩。

正当本《志》即将完稿之时,融宗禅师圆寂,离开了人世。融宗嗣法之徒真法和尚,继融宗之志,终使这本《邓尉山圣恩寺志》得以问世。

当本《志》完稿之时,世界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这一世纪,又将是环太平洋带崛起的时代。目前,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发展生产力是头等大事,科学、理性依然是民族自立的基本条件。但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人们已开始重视电子计算机之类无法表达的东西,希望恢复自己丰富的心灵。因为科学缺乏道德,有时足以招致人类的毁灭,所以现代科学家爱因斯坦曾试图寻找一连通人类文明与科学之间鸿沟的桥梁,他曾说:“假使有一种宗教能配合现代科学的需要,那可能就是佛教了。”对佛教寄予厚望。现代科学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仁爱——能使人们的情意温馨;只有慈悲——能使人们的精神升华;只有智慧——才具有比科学技术更完美的德性:它们是思维的灵性之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对佛教十分重视,他不仅自己认真研读过《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佛教经典,还在其谈话、文稿中多次称颂“佛教有很高的威信”(如《人民日报》1951年5月26日社论);称颂释迦牟尼“学问很高”,在“青年时候便创立佛教”。在